

私塾

清代
江南乡村塾师
与
地方社会


蒋威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清代
江南乡村塾师
与
地方社会

蒋威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江南乡村塾师与地方社会 / 蒋威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7

ISBN 978 - 7 - 5203 - 4536 - 1

I. ①清… II. ①蒋… III. ①农村—私塾—教师—研究—华东地区—清代 IV. ①D663.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10710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刘芳
责任校对 王龙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9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1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18
插页 2
字数 268 千字
定价 8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2015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15YJCZH072)“清代江南乡村塾师与地方社会”结项成果

目 录

绪论	(1)
第一节 选题的缘起	(1)
第二节 国内外的研究动态及发展趋势	(3)
第三节 研究方法	(18)
第四节 所用资料	(21)
第五节 研究内容、思路及结构	(24)
第一章 清代江南乡村塾师的兴盛及基本构成	(29)
第一节 清之前民间塾师的产生与发展概况	(29)
第二节 清代江南乡村塾师的兴盛	(35)
第三节 清代江南乡村塾师的学历构成	(48)
第二章 清代江南乡村塾师的经济生活	(59)
第一节 清代江南乡村塾师的职业收入	(59)
第二节 清代江南乡村塾师的家庭收入	(68)
第三节 清代江南乡村塾师的家庭基本消费	(79)
第四节 清代江南乡村塾师经济生活的贫困化 及相关问题	(87)
第三章 清代江南乡村塾师的馆居生活	(103)
第一节 清代江南乡村塾师的觅馆与荐馆	(103)
第二节 清代江南乡村塾师的课内教学活动	(112)



第三节	清代江南乡村塾师的课外业余生活	(121)
第四节	清代江南乡村塾师之偷情与拒奔女现象	(130)
第四章	清代江南乡村塾师的社会交往	(135)
第一节	清代江南乡村塾师与东家的交往	(135)
第二节	清代江南乡村塾师与弟子的交往	(147)
第三节	清代江南乡村塾师之间的交往	(156)
第五章	清代江南乡村塾师与乡村社会	(161)
第一节	清代江南乡村塾师与乡村教化	(161)
第二节	清代江南乡村塾师与乡村杂事	(184)
第三节	清代江南乡村塾师在家与族中的活动	(196)
第四节	清代江南乡村塾师与乡村公共事务	(203)
第六章	清代江南乡村塾师的个案研究	(211)
第一节	张履祥的乡村塾师生活	(211)
第二节	陈梓的乡村塾师生活	(222)
结语	(262)
参考文献	(266)
后记	(285)

绪 论

第一节 选题的缘起

选取清代江南乡村塾师为研究对象，完全是受社会史研究旨趣的影响。在社会史的研究中，关注下层普通民众生活、关注乡村社会及重视区域研究是其显著的特色。王学典先生认为：“如果说，从理论和方法上看，史学先后经历了社会学化、经济学化和人类学化的话，那么，从题材上看，史学则越来越走向民间的历史、普通民众的历史、生活深处的历史。近若干年来，则特别集中到乡村史上来，乡村社会史研究已成为一个新的势头。”^①乡村塾师乃是扎根在传统乡村学塾中从事初等教育的老师。几千年来，他们作为传统文化知识的承载者与传播者，对我国文化的传承、基础教育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乡村塾师群体中虽然不乏进士、举人等社会精英分子，但绝大部分还是生员和童生等底层读书人。他们长期在基层社会中默默无闻，其嘉言懿行也往往不出里巷，长期湮没于历史长河之中。所以说，乡村塾师应当属于历史上的“小人物”。

然而，像乡村塾师这样的历史小人物，却对乡村社会的风俗文化及基层教育乃至社会结构变迁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在明清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科举考试的全面推行，政府对社学、义学的大力提

^① 王学典：《中国崛起进程中的史学变迁——近30年大陆历史研究的几种主要趋势》，《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倡，读书识字成为当时的社会风尚，出现了几乎村村有塾的景象。作为私塾的组织者和实施者，乡村塾师自然而然地成为基层社会一个有一定规模的特殊群体，成为研究乡村社会史不得不关注的对象。吴琦先生认为：“社会群体对于史学研究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应该成为我们审视社会发展与变化的有效视角，尤其是对于方兴未艾的社会史研究，当为不可或缺的学术视点与研究路径。”^①从这个意义上说，本研究乃是乡村社会史的组成部分，可以丰富与发展江南乡村社会史的研究。

在研究乡村塾师的时空上，选取清代与江南也有一定的主客观原因。笔者在硕博时期所学专业为古代史中的明清史，自然在选题的时代上偏向于明清。同时，研究历史上像乡村塾师这样“小人物”群体的主要问题是史料的相对缺乏，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从浩如烟海的资料中寻找只言片语。在古代史研究领域里，清朝作为距今最近的一个封建王朝，留下的历史文献资料最为丰富，所载的乡村塾师的资料超越以往的任何朝代，为研究提供了极大的可行性。再者，就研究塾师的学术史而言，刘晓东的明代塾师研究与蒋纯焦的近代塾师研究已经有著作出版（见下文学术史回顾），所剩的较佳空白年代就只剩下清代了。上述所言，即是本人选取清代作为研究时代的原因。

下面就为何选取江南作为研究乡村塾师的区域做一简单说明。在分析原因之前，首先要对本书所选取的江南的区域范围作一介绍。学术界关于江南的界定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有：“八府一州说”^②，即苏、松、常、宁、镇、杭、嘉、湖以及太仓州；“六府一州说”^③，即苏、松、常、杭、嘉、湖以及太仓州；与“五府一州说”^④，即苏、松、

① 吴琦：《明清社会群体的新趋向》，《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② 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范金民：《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入门》，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10页。

③ 徐茂明：《江南的历史内涵与区域变迁》，《史林》2002年第3期。

④ 冯贤亮：《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常、嘉、湖及太仓州。本书所采用的江南区域是八府一州，具体原因参考李伯重与范金民两位先生的论述，在此不做赘述。至于选取江南作为研究区域的原因主要有如下两点：一是选取江南做区域社会史研究，乃是顺应当下社会史研究的一种潮流。区域社会史既是深化社会史研究的一种方法，也是社会史研究的一种潮流。常建华先生认为，2007—2017年的社会史研究的特点是：“该时期由社会经济史研究发展演变出来的历史人类学与区域社会史研究蔚然成风，社会生活史、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发生了向日常生活史的转变，在新历史认识论影响下民间文献更加受到重视。”^①二是江南社会文化极其发达，能够提供比其他地域更为丰富的资料。上海书店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的32册《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中，江南乡镇志就占了23册。可见，选取江南为研究区域，具有独厚的资料优势。

除了上述原因之外，研究清代江南乡村塾师与地方社会还有如下几个方面的意义。一是，我们研究清代江南乡村塾师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状况，可以再现历史上乡村社会“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为当今社会中人们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失衡提供经验和教训。二是，研究清代江南乡村塾师在地方社会曾经发挥的作用，可以窥见当时乡村民众的生活状况和风俗民情，为当今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借鉴。三是，在当今社会上时而出现“国学热”和“私塾热”的背景下，对于江南乡村私塾中塾师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进行一定的研究和总结，也更显得具有非同寻常的现实意义。总的来说，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能够为更加真切而清晰地反映清代基层乡村社会的历史图景做出有益的努力，为解决现实社会中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难题提供历史的经验与教训。

第二节 国内外的研究动态及发展趋势

与清代江南乡村塾师研究相关的著作和论文主要分为三类：一是

^① 常建华：《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第2期。



关于私塾与蒙养教育的研究；二是关于士人的研究；三是关于塾师的研究。其中，不少作者的论著或者学位论文包含了其发表的论文，此种情况主要介绍其著作或者学位论文，所发表的论文则从略。在介绍这些成果时，对属于江南地区的研究成果作特别的论述。

一 私塾与蒙养教育研究

(一) 私塾研究

1. 社学和义学研究

研究社学的第一要义是解决其社会属性问题。以陈剩勇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社学是官立初等学校。^①王日根首先对此说提出质疑，但是对社学的社会属性没有提出明确的观点。^②日本学者五十岚正一认为，洪武八年所建社学当属于“官学”性质。而洪武十六年命民间重建社学，并令“有司不得干预”后，社学开始演变为民间之一种私学。但正统之后，社学又回复到了“官学”的轨道之中。^③赵毅和刘晓东则认为，明代社学虽然表现出了一定的“官学”特征，但从其社会稳定性、经费来源、日常管理及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来看，还是属于“私学”范畴之内。^④施克灿从举行乡约、举行各种礼俗活动、进行社会评议三个方面探讨了社学的教化功能。^⑤还有一些学者对特定区域的社学进行了具体而深入的研究。^⑥

义学研究也是成果颇丰。陈宝良在《明代的义学与乡学》^⑦中，

① 陈剩勇：《清代社学与古代官办初等教育体制》，《历史研究》1995年第6期；陈宝良：《明代的义学与乡学》，《史学月刊》1993年第3期。

② 王日根：《“社学即官办初等教育”说质疑》，《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

③ [日]五十岚正一：《中国近世教育史的研究》，国书刊行会1979年版，第1—61页。

④ 赵毅、刘晓东：《明代“社学”之社会属性辨析——兼及“乡村教化”与社会软性控制》，《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⑤ 施克灿：《中国古代社学教化职能初探》，《教育学报》2010年第1期。

⑥ 蒋立松：《清前期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社学、义学发展述略》，《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4期；李绪柏：《明清广东的社学》，《学术研究》2001年第3期；李良品：《明清时期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社学研究》，《民族教育研究》2008年第5期。

⑦ 陈宝良：《明代的义学与乡学》，《史学月刊》1993年第3期。

探讨了明代义学代替社学的原因，义学设立的形式，及其社会影响。缪心毫在《清代义学生存困境分析》^①中，从义学的经济状况、教育水平等方面对清代义学的生存困境进行分析，试图揭示晚清义学的衰败原因。陈建国的《论明清时期义学的办学机制》^②一文，对明清民办教育中义学的办学目的、教学内容和运作方式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在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边疆地区的义学发展极为迅速，所以义学的区域研究就成了研究的热点。^③

江南地区的社学与义学研究虽然与江南农村经济研究、市镇研究、家族研究及商业研究等热门领域相比稍显单薄，但是还是取得了一些学术成果。如范裴裴的硕士学位论文《明清时期江南地区义学研究》^④对明清时期江南义学的发展状况，江南义学的创办与规模，江南义学的管理运作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田张霞的硕士学位论文《康熙年间江南地区社会教化研究》^⑤则对江南地区社学与义学的教化作用进行了论述。

2. 私塾研究

“私塾”作为私人学塾的专称，是伴随着新式学堂的出现而被人们广泛应用的。所以，私塾与学堂并存的二元教育结构，往往成为学

① 缪心毫：《清代义学生存困境分析》，《历史档案》2006年第2期。

② 陈建国：《论明清时期义学的办学机制》，《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③ 于晓燕：《清代云南官办民助初等教育“义学”探析》，《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于晓燕：《试论清代南方民族地区的义学》，《思想战线》2008年第1期；李良品：《清代乌江流域民族地区义学教育研究》，《教育评论》2008年第4期；彭永庆、刘鹤：《清代湘西民族地区“义学”教育的历史考察》，《民族教育研究》2008年第5期；宋荣凯：《清代贵州民族地区义学试探》，《贵州民族研究》2009年第4期；王启明：《晚清新疆义学建设的历史考察——以吐鲁番为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5年第2期；白林文：《论清代贵州义学发展及其功能》，《贵州民族研究》2016年第1期；朱静：《清代山西义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西师范大学，2017年。

④ 范裴裴：《明清时期江南地区义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2010年。

⑤ 田张霞：《康熙年间江南地区社会教化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2006年。



者们关注的话题。贾国静的《私塾与学堂：清末民初教育的二元结构》^①一文提出，清末民初，私塾仍占有相当比例，非学堂所能取而代之。学堂取代私塾虽是大势所趋，但私塾顽强的社会适应性与学堂教育的不成熟使二者既存在冲突与竞争，又存在互补与传承。郝锦花、王先明在《论20世纪初叶中国乡间私塾的文化地位》^②中认为，清末学制改革后，乡村社会形成了别具特色、新旧并存的二元教育模式。这种新旧对峙的二元教育结构中，乡间私塾以其特有的灵活性和乡土适应性位居乡间文化的霸主地位。乡间私塾不仅在数量上超过了乡村学校，而且在社会功能上仍然是社区的文化活动中心，并更显突出。渠桂萍、王先明的《乡民视野中的私塾与学堂——20世纪前期乡村教育现代化的历史阙失》^③一文，从乡村民众的视角，重新审视乡民在20世纪前期回避、抵制与抗拒学堂而青睐私塾的现实原因。

左松涛在《新词与故物：清季以来所谓“私塾”问题的再认识》^④中，对于“私塾”一词的使用来源进行了探讨，认为由于趋新尊西的知识立场，“私塾”常带贬义，暗指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的守旧落伍。但以新/旧、传统/现代、正规/非正规、文明/野蛮等二元对立方式叙述近代教育历史，不仅扭曲事实，而且会产生认识偏弊。姜朝晖的《1930年代中期新旧教育二元并存格局初探》^⑤一文认为，民国时期，基础教育领域始终是新旧教育并存的二元化格局。以1935年为例，官方的全国性的调查统计认为私塾规模小于新式学校；但是从全国到省，再到县区乡的调查数据显示：越往基层，私塾的规模也

① 贾国静：《私塾与学堂：清末民初教育的二元结构》，《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② 郝锦花、王先明：《论20世纪初叶中国乡间私塾的文化地位》，《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③ 渠桂萍、王先明：《乡民视野中的私塾与学堂——20世纪前期乡村教育现代化的历史阙失》，《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④ 左松涛：《新词与故物：清季以来所谓“私塾”问题的再认识》，《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⑤ 姜朝晖：《1930年代中期新旧教育二元并存格局初探》，《齐鲁学刊》2013年第3期。

越大；民间研究也认为私塾超过新式小学的数量和规模超过官方的统计。刘熠在论文《虚实之间：晚清私塾与学堂之争——以四川省为例的考察》^①中指出，从四川省的情形看，清末私塾与学堂的差别，有一个逐渐被百姓认识、了解的过程。在官府眼中，私塾越来越被认为是学堂的阻力，成为“改良”、封禁的对象。私塾对学堂的阻力不少是官府整饬私塾所致，一些基层官民也一再强调泯除二者的区隔。清末私塾与学堂的对立，既是实际存在的，也有被构建、想象的层面。

研究私塾的另一个热点就是对于私塾改良相关问题的研究，^②而私塾的区域研究也引起了部分学者的兴趣。^③在私塾的区域研究中，江南地区的私塾研究非常薄弱。就已有的成果看，大多数的私塾研究是与社学、义学放在一起论述的。如张鸥翔的硕士学位论文《明清江南市镇民间教育探析》^④对社学、义学、私塾的发展与类型、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及管理体制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二）蒙养教育研究

蒙养教育是中国古代教育史研究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很多学者对此展开研究。如毛礼锐、瞿金农、邵鹤亭编著的《中国古代教育史》对中国古代的教育进行了研究，其中的第八章设专节论述了宋元

① 刘熠：《虚实之间：晚清私塾与学堂之争——以四川省为例的考察》，《江苏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② 熊贤君：《中华民国时期私塾的现代化改造》，《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8年第3期；张彬、秦玉清：《近代浙江的私塾改良》，《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柳琴、左松涛：《略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私塾改良》，《历史档案》2002年第2期；罗玉明、汤水清：《三十年代南京政府对私塾的改造述论》，《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田正平、杨云兰：《中国近代的私塾改良》，《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贾国静：《清末的私塾改良及其成效》，《安徽史学》2006年第4期；贺军妙：《清末民初小学所改良私塾活动述评》，《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第9期；杨光辉：《20世纪30年代私塾改良及其成效》，《史学月刊》2016年第7期。

③ 黄政：《福建私塾述略》，《教育评论》1994年第5期；彭福荣：《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私塾教育的发展历程、特点及启示》，《教育评论》2007年第1期；许希军：《民国时期安徽私塾整顿论析》，《安徽史学》2014年第6期。

④ 张鸥翔：《明清江南市镇民间教育探析》，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12年。



明清时期的私学与蒙养教材。^① 吴霓的著作《中国古代私学发展诸问题研究》，对我国古代的私学教育中初级形态的蒙养教育和高级形态的书院教育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且认为宋元明清时期的私学初级形态的发展特点是私学的社会化与蒙学化。^②

在论文中，蒙养教育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就是对于古代蒙养教材的研究。^③ 除此之外，一些论文在研究蒙养教育的过程中，对塾师问题有所涉猎。如李琳琦在《明清徽州的蒙养教育述论》^④ 一文中认为，明清时期，徽州的蒙养教育高度普及，由于塾学的广泛设置，从而使塾师的从业人数大为增加，当时徽州社会对塾师的需求量有增加的趋势。郭英德在《明清女子文学启蒙教育述论》^⑤ 一文中涉及明清时期塾师中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即女塾师。虽然这些文章不是专门研究塾师的，但是其中一些论述及观点，对于研究塾师有很高的价值。

关于江南地区蒙养教育的状况，一些学者或有专门论述，或者在研究其他问题时有附带论述。一些学者比较关注江南蒙学教材方面的研究。如张雁在《晚清苏南家族蒙学课程的变迁及其特点》^⑥ 中对晚清江南地区家族蒙学课程内容的变迁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与论述。

① 毛礼锐等编著：《中国古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414—431页。

② 吴霓：《中国古代私学发展诸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③ 陈艳华：《我国古代的蒙学教材》，《教育科学》1999年第1期；颜佳琪：《中国古代蒙学教材的发展状况及其特点》，《辽宁教育研究》2001年第9期；李良品：《试论古代蒙学教材的类型、特点及教育功能》，《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王超明：《古代蒙养教材编辑出版中的“人本化”倾向》，《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8期；颜佳琪、钟江华：《浅论中国古代蒙学教材中的传统文化精神》，《辽宁教育研究》2005年第7期；杨宏：《论蒙养教材的伦理价值》，《教育评论》2010年第2期；白少霞：《宋元明清时期道德类蒙养教材的基本特征及价值意蕴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7年。

④ 李琳琦：《明清徽州的蒙养教育述论》，《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

⑤ 郭英德：《明清女子文学启蒙教育述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⑥ 张雁：《晚清苏南家族蒙学课程的变迁及其特点》，《江南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9年第3期。

冯保善在《明清江南教育大众化与通俗小说读者市场》^①中以明清时期江南蒙学的发展状况与蒙学教材的收字数量来考察江南大众教育普及的程度。张彬在《浙江教育史》^②一书的第四章专设一节讨论蒙学与蒙学教材。一些家族教育研究常常会涉及蒙养教育。如丁蓉博士学位论文《科举、教育与家族：明清常州庄氏家族研究——以毗陵庄氏族谱文献为中心》^③的第四章第一节专门设一目《明清常州庄氏家族的蒙学》，描述了明清时期常州庄氏家族对蒙养教育的重视及其尊师重教的传统。

李伯重先生对江南地区的蒙养教育有一定的研究，其系列成果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其论文《八股之外：明清江南的教育及其对经济的影响》^④将明清时期的江南教育分为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精英教育主要针对科举考试，而大众教育则主要培养读写能力与计算能力，并详细介绍了两种教育的主要内容。他的《19世纪初期华娄地区的教育产业》^⑤一文以19世纪松江府的华亭和娄县两县为例，对当时学校的主要类型及其功能定位、教育的规模与投入，以及教育产业在经济中的地位等问题，进行探讨。文中还特别指出，在一个州县，通常有几千个塾师职位。因为记载匮乏，很难确知19世纪初期华娄私塾教师收入到底有多少。

二 士人的研究

古代知识分子的研究，是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而明清的士人研究更是成果累累。本书并不对整个古代的士人研究进行回顾，而是主要回顾明清士人研究中涉及塾师研究的部分成果。在这些成果中，

① 冯保善：《明清江南教育大众化与通俗小说读者市场》，《文艺研究》2018年第6期。

② 张彬：《浙江教育史》，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③ 丁蓉：《科举、教育与家族：明清常州庄氏家族研究——以毗陵庄氏族谱文献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2年。

④ 李伯重：《八股之外：明清江南的教育及其对经济的影响》，《清史研究》2004年第1期。

⑤ 李伯重：《19世纪初期华娄地区的教育产业》，《清史研究》2006年第2期。



江南士人研究则给予特别的关注。

教书乃士人之恒业。一些研究明清时期士人的著作与论文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士人的处馆生活。如刘晓东的《明代士人生存状态研究》一书，对士人的治生之道、社会交往及科举生活进行了研究。作者把明代士人的治生之道分为本业治生和异业治生。教授、游幕和卖文为本业治生；耕读、医卜和工贾为异业治生。教授之士可分为学者型、科举型与启蒙型三类，其经济收入的多寡取决于三方面：学识、身份以及受业学生的发展状况。^① 陈宝良的《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一书是当前对明代的生员研究最为全面和深入的著作。该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从学校与科举入手，考察生员的产生，在学校的肄业与考核，以及如何步入仕途。下编为本书的亮点，从社会视角考察生员的社会流动及其社会动作。其中的第六章考察了生员层的社会职业流动，有训蒙处馆、游幕、行医、从商、做讼师、弃巾等。在《训蒙处馆》一节中，作者认为，教书是知识阶层谋生最为常见的职业，无论是进士、举人，抑或监生、生员、童生，均不乏舌耕糊口之人。塾师可分为蒙师和经师，可自己开馆，亦可外出坐馆。特别是在明代出现了地域馆师，浙江余姚和江西的南昌及安城均以盛产塾师而闻名。^②

赵园在《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中，对明代遗民的生计状况进行了研究，认为力田、处馆、游幕和经商是他们谋生的主要方式，并且探讨了遗民的治生观。^③ 张仲礼用英文在1955年出版《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1962年出版《中国绅士的收入》。现在两书的译本合为《中国绅士研究》，分上下两编出版。该书以地方志和家谱为主要史料，研究了19世纪中国绅士的社会作用与经济收入问题。书中的绅士主要为取得生员及以上功名的读书人，他认为其中的1/3有过教书经历或者以塾师为终身职业，其中有绅士身份的塾师的平均年收入为100两，而书院的山长为每年

① 刘晓东：《明代士人生存状态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

② 陈宝良：《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③ 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50 两。^①

明清江南士人研究同样成果丰硕，这里主要选取一些涉及江南塾师研究或者能够为江南塾师研究提供有力参考的成果。有的成果所研究的江南士人或者本身就是乡村塾师，或者曾经处馆为生。如刘昶的硕士论文《晚清江南慈善人物群体研究——以余治为中心》^② 所论述的晚清江南无锡县乡间慈善家余治同时也是一位乡间蒙师，对其所从事的慈善活动及其动因与影响进行了论述。尹逊才的论文《晚清江南儒生阶层与乡村伦理秩序的重建——以余治为中心的教育考察》^③ 论述了儒生余治通过改善蒙学教育、撰写善书、收毁淫书、建立善会善堂等方式教化乡里，并通过教化与抚恤善后，来重建太平天国破坏后的乡村秩序。吴琛瑜的硕士学位论文《清代前中期江南无功名下层士人社会生活探研——以姚廷遴、沈复、顾震涛为例》^④ 中的苏州下层士人顾震涛即是一位乡村塾师。文章对顾震涛的成长过程、家族状况及社会生活进行了研究。嵇姝姝的硕士学位论文《张文虎：清代江南一个绅士的生活变迁》^⑤ 所论述的南汇人张文虎曾经在金山乡间做私塾老师 30 多年，在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到曾国藩幕府游幕，校勘书籍，编纂方志，成为晚清著名的经学家与校勘家。上述研究底层士人余治、顾震涛与张文虎的论文虽然对其坐馆生涯论述不多，但是为塾师个案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还有一些江南士人研究成果虽然没有论述乡村塾师的内容，但是却为研究江南乡村塾师的性情及其在基层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等问题

① 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② 刘昶：《晚清江南慈善人物群体研究——以余治为中心》，硕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09 年。

③ 尹逊才：《晚清江南儒生阶层与乡村伦理秩序的重建——以余治为中心的教育考察》，《徐州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1 年第 1 期。

④ 吴琛瑜：《清代前中期江南无功名下层士人社会生活探研——以姚廷遴、沈复、顾震涛为例》，硕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05 年。

⑤ 嵇姝姝：《张文虎：清代江南一个绅士的生活变迁》，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9 年。